



物我会通:天地有大美

走出宽窄对立的怪圈

■王蕾

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句出自《庄子·知北游》,全句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理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观于天地便是观“道”,大则是自由,美则是“自然而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整句讲出了庄子的核心思想,即天地万物有其天然的规律,天地之大美、四时之序列、万物之荣枯,皆因自然伟力。其不言、不议、不说,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方法论——自然而然,物我会通。

而与其相对的便是“村”言、议论、“戏”说,村言指人的谎言、议论指人充当审判官、戏说指以虚无的态度来叙述。言、议、说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物我对象化的情景中,所有的言、议、说皆让人陷入自身与他者的对立关系之中,他者成为自身的附加属性,从而导致人与他者的矛盾,自身的朴素和率真抛诸脑后,我们把自己“囚禁”在一个痛苦的世界中。

天道与人道

无为是天道,有为则是人道。

庄子极为推崇自然之美,何谓自然之美,在庄子看来,其由天道所成就,其特质是朴素的、率真的。朴素,就是依照本性,不经雕刻修饰;率真,就是率性自然,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与自然之道本性相合。

庄子在《天道》中提到:“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从中可以看到,朴素是庄子天地有大美之重要环节。朴素是人的思想复归精神家园,是放任天性的本然状态,就好比我们在嘈杂的世界奔劳,不停地东奔西走,蓦然回首时,才发现思婴儿般的生命本初更让人安宁,那是一种简单的、纯真的美好境界。

由此也引出了另一种美之特性:率真。朴素是性,率真是情。

率真其重点在真,就像非常著名的东施效颦一样,西施心疼,捧心蹙眉更添其美,因其是自然而为,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东施效仿,少了真情实感,只让人觉得尴尬和矫揉造作。那么,真因何而美呢?庄子在《天运》对真有这样的描述:“真者,精诚所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者虽悲不哀,强强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所谓真也,便是道法自然,也等同于至美,是美的最高阶境界。真情自然流露才能动人,个性的自然发展,人才能宽广,它是

真的,也是美。

相对的,骄饰和伪装,就是有损天道,是有为,是人道。庄子天运中用到一个“强”字,它是人道的高度概括。强是成功、权力,是社会法则,它把人推向了美的对立面,生存的挣扎中。

著名的浑沌之死便是有违天道的例子:倏与忽以为“人皆有七窍以试听息食,此堵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人道,有违天道,便造成了这个悲剧。庄子所讲人道都带有聪明、捷径的成分,“是故鬼脍虽短,续之则忧,鹤脍虽长,断之则悲。”《骈拇》中讲马的本性本是吃草饮水、自由奔跑,而伯乐却反其道而为之,为马烧之、剔之、刻之、锥之,破坏了马之本性,致马死伤无数,庄子为我们提供了伯乐相千里马的另一种思考,千里马到底需不需要伯乐?庄子认为,千里马不需要伯乐,一旦幽禁于伯乐的规则中,便有违天道,是窄的人道。因此也走向了美的反面,真正的人道,应是顺应自然的势态有所为。

而窄的人道是什么样呢?庄子在《骈拇》中也有指出,“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索。”人的行为却往往相向而行,常常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约束本性,走向美的反面,以窄的人道的名义破坏美、损害美。

“大樗树下”与“栋梁之材”

樗,大树,无用之材。

在《逍遥游》中,有这样的记载,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雍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代表了庄子的游世思想,意即处世法则,物必须对人有用吗?

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就是“游世”与“人世”的对话。从“人世”的角度讲,物在人的法则中必须要有意义,即它对人

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其被具体化、实用化。惠子这里的实用性,之于人,就是“栋梁之材”的现实性“逼迫”,人远离自我,被承载了人自身或许本不该承载的重担。

而庄子的“游世”思想:大树(樗)不必陷入人的法则中,它本来生长在自然之野种,自然才是它的归属,在自然界里,大树就是大树,它因为大树自身而是其自身,在自然界中,它才是物的自我,它不因人而成长。

所谓大樗树下,如果说大树回到它自身的话,那在大树下的逍遥者也回到了人自身。

人和物都被世间法则拖累,有用性成了其最大的价值评估。

庄子基于此,提出人回到自身和物回到自身是同一过程,不管是人与人,还是人与物,人都要走出人与他者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庄子的人生历程来看,它践行了游世思想,它是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的另一个注脚,万物其意义都在于其存在的本身,人在万物之中,与万物映照,人游走着,不求得失,无所谓物我意义,如自然存在般、如自然消失般,坦荡荡,这样的天真、纯粹就是天地有大美了。

庄子的游世思想不是避世,不是江湖之士远离社会而隐迹山林,居江湖之远,也不是人世,讲究三从四德,居庙堂之高。而是若即若离的态度,是藏迹于世俗生活之中,又是与社会保持距离。游,既是若即,又是不即;是若离,又是不里,是心灵的一种宽窄之道,一种宽窄性的艺术性的生命态度。

若即若离的生命态度,不等同于游戏人生,不等同无意义的虚无,它是宽窄有度,宽与窄处在生命平衡的天平点上。游戏人生,是消极的,用无所谓的态度来逃避痛苦,用戏谑的态度来迎接快乐,它是悲剧性的也是喜剧性的。庄子的游世,是审美的生命态度,是宽窄之于生命的风格化,不居庙堂、不入俗世,物我合二为一,天地之间,悠然自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苁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夏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认为,生命由气聚而成,人的死亡如气散一样,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生死与四

时交替时序一样,自然而然、自然而去。不同于生死有命,命运摆布生死的说法,命运的总结性关照,把人推向悲剧性的彼岸,生命远离人自身,成了一出戏,一场饭后谈资。而庄子的生死观,由人自身艺术性的掌握生命,不物化生命,生命与人是一体的,生命是美的,但不为他者美,它是人自身的大美。

庄子的生命态度,看似是矛盾的,一方面以自然而为,让归隐者灰暗的主题叙述仿佛抓到了继承的脉搏,以逃避现实和归隐山林,来实现生存意义;另一方面,庄子又反对这种躲避,他认为在这种归隐的存在选择中,个人的出路是找不到的,因此庄子以“游戏”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世界、个人生死,来面对人生可能面对的一切,由此庄子的生命态度又将传统归隐的意义瓦解。所以,庄子的态度是超越性的,它超越了矛盾性,它是一个新的生命主题,自我本身的“放逐”,达成自我本身审美的“存在”。

物我会通:宽窄不对立

宽与窄的“对立”关系,在现代尤为甚,这种对立关系犹如现实中的物我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艺术创作领域中,数次提及,即物我的对立关系,事物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其自身固有属性的反面。

宽窄的对立性,在现代性中,有一个同名词,即异化,包括人与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

人与人的异化:利益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无异,人是他人的囚徒,在“监禁者”与囚徒的人际关系演绎中权力介入,人和他人相互“折磨”,精神交流的通道被堵死。

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由人组成,但这个众人“堆积”的社会,却成了吞噬人的黑洞,人在其中茫然无助,人被社会“疏离”。

人与自我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对峙,现实理性压迫人的本性,在“理性”的撕扯下,人的精神变得异常混乱:抑郁症、多重人格等精神疾病成为流行病。

人与自然的异化:物质欲望的张扬,科学技术作为唯一的真理,肆意掠夺自然,自然成为人的有用性对象,实用性占据上风,导致人文精神流失。

这些异化,让世间万物处在对立的关系中,这与庄子“天地有大美”的思想截然不同,庄子讲物我会通、顺应本心,然而当代社会物我不通、本心丢失,所以说,庄子思想对于我们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有个重要的观点,即人存在于现世里的梦境感,《齐物论》里讲: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这种梦境感就是讲人与他者(世界)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人与世界的关系犹如梦中梦的关系,人生在世界这个梦中,人生又如梦,就是一环套一环的梦,人即使明白自己在梦中,告诫自己不要做梦,但这告诫之言还是梦中之言。

层层叠叠的梦境,喻示着这个世界毫无道理可言,真理不可追寻,人在其中充满了偶然性,缥缈其中,彷徨挣扎,看不到也找不到通向坚实稳定的道路。

庄子哲学中的“道”,就是指这种梦境,它不是简单的虚无缥缈,而是从最初级的虚无到找寻真理的准确后,再回到一种自然而然,一种大无形、物我会通的境界。

庄子的梦境感知,超越了现代性中的现实,现实世界的异化现象,就是人为自己披上了皇帝的新衣,找寻一个违背人生梦境感的“确定感”,然而这些“确定感”是认知偏差,也是自我蒙蔽,简单地说,确定感就是我们的自身意志,为了确定感,我们把自身意志附加于任何对象身上。

他者成为人的有用性对象,这里的他者包括自然、他人、自我等,我们以功利化的目的、用科学制度手段,实现他者成为“我”的实用性对象。这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对立,人与他者的矛盾越来越深,我们用确定感让自身陷入了矛盾对立的怪圈之中,物质的唯一确定感和精神的混沌感让我们对亲手锻造的世界产生迷惑,我们自己让自己走入一个牢笼中。

庄子哲学的现实意义便在于,它教我们认清物我的关系,而实现的方法也不难,由我们的心来划定。走出怪圈,只要遵循我们的内心就可以了,不要自我设限。

如果说宽代表我们的智性,窄代表了现实,实现宽窄的融会贯通,走出宽窄的天然对立关系,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便是最好的方法,不物化他者,不“囚禁”自己,让世界在他自身中成为他自己,让自我在自身中成为自己。

儿时天趣在宽窄之乐中自在无邪、无拘无束释放

唱着儿歌逛灯会

“磨刀”话音一落,大家一齐出掌喊数,以猜对者胜。胜者有权刮输家鼻子。如果说宽之乐在于胜者,那么,窄之沮就在于输家。

虽然猪年春节已经过去,回想起从前的过年的快乐,还是感慨万千,回味悠长。

灯会是在元宵赏灯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南宋诗人陆游在《丁酉上元》诗中描述成都灯会盛况是“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午门,灯山万炬动黄昏”。

过年必定要看灯会。近几十年,这种兴趣荡然无存。没有灯会的春节年味就淡了许多。有灯会的年春节味道就更浓。

从1962年起,成都恢复春节灯会,会期一个月,今年已经举办50多届。灯会期间,公园内有民间曲艺、杂技、杂耍表演;有各种地方风味小吃;还有倒糖饼的,卖风车的,捏泥人的……好生闹热,每届灯会游人都百万人次以上。而今,灯会举办地在塔子山公园。

记得小时候,大院的左右邻舍邀约一道看灯会,男女老少不下十多位。吃罢晚

饭便开始从一号线走路到青羊宫。大约十多站,要走一个多小时。孩子们都很兴奋,一路走一路唱:“成都是个好踏踏,东城区连着西城区,成都小吃多又多,你听我来说一说,赖汤圆的心子多,陈麻婆的豆腐麻,夫妻肺片麻又辣,成都是个好踏踏。”那时成都不大,市区只有东、西城区,金牛区包围成都一圈。

唱儿歌不仅仅是唱,而且是充满童趣智慧的一场游戏。

青羊宫每年春节举办灯会、花会,自然成为市民游玩的中心地区。有时候灯会还有“打金章”,“打金章”是旧时成都武林打擂比赛的称谓,无论何人皆可上台比试,最后获胜者将得到象征荣誉的金章。

1918年,由当时四川军政首脑赞助,四川武士会主办的四川打擂比赛正式在成都青羊宫花会举行。以后,来自各地的武林高手每年大年或春季云集在青羊宫花

会上的擂台,用拳脚棍棒上演一幕幕惊险而刺激的大戏,而这场擂台的冠军就可以获得金章,第二名为银章,第三名为蓝章。当时许多武林人士都以获得“金章”为荣。春节“打金章”多为活跃节日气氛,输赢并不重要。

到达青羊宫时,小伙伴们唱起儿歌:“青羊宫真热闹,糖油果子三大炮,有的哭有的笑,哭的包包被挤掉,笑的吃到三大炮。”有意思的是,包包挤掉而不是被偷,说明当时治安比较好。笑的吃到三大炮。今天看来三大炮太寻常,当年物质匮乏,这是只有在过年才能享受到的奢侈。比之当今,物质虽然匮乏,但儿时幸福感还是强烈许多。

唱罢儿歌又开始拾拳儿,当时最经典的童孩游戏,也可称之为孩子的划拳游戏。通常我们称之为“石头剪刀布”。一边走,一边玩,顺口溜:“一只螃蟹八字

脚,两个眼睛这么大一砣。砣砣砣,砣砣砣,剪刀怕,识大拳儿。”

接着,又变化花样玩起“井冈山上红旗飘,阶级敌人在磨刀”的游戏。“磨刀”话音一落,大家一齐出掌喊数,以猜对者胜。胜者有权刮输家鼻子。如果说宽之乐在于胜者,那么,窄之沮就在于输家。那时物质不丰富,精神却异常愉快。儿歌就是活跃整个氛围的添加剂。

不知不觉来到青羊宫。进到灯会现场,人山人海,那是一个挤,没有空隙,机械地跟着人流涌动。听到最多的声音:二娃子、王么妹,喊声一片。挤丢了,靠喉咙找回,必须扯起嗓门吼。比较小的孩子一般骑在大人脖子上,成都话叫骑马马肩儿。乱跑的小孩被大人一阵训斥。

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当然还是小吃摊点。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很是诱人。寻常大人们舍不得花钱,唯有此时,尽量满足

孩子们的需求,一般来讲大人不会给自己买的,在一旁看见孩子们吃得欢也很高兴。

玩够了,吃饱了,晚上10点钟回来的路上,小伙伴们兴奋不减,齐声唱到:“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骑白马。白马骑得高,胖娃耍关刀,关刀耍得圆,胖娃吃汤圆,汤圆吃得多,窝屎窝坨坨。”酒家喜欢这样的感觉,自在无邪,无拘无束。

几年之后,开始骑自行车去逛灯会,一个车搭一个大人,有的自行车加边座,称之为“烔耳朵”,从琴台路十二桥省医院及锦里东路大半圈,全是自行车。灯会打烊后,要从几万辆车堆里准确找到自己的自行车,那是功夫。很奇怪的是就这样也没发生过丢车事件。再过了几年,基本上没有踏入灯会现场了一直至今。

回想起儿时的过年,宽窄之乐在灯会充分释放。



■时非